



戒日王研究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Harṣavardhana,
or Śīlāditya, 590-647 AD**

张远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文学系列

戒日王研究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Harṣavardhana,
or Śīlāditya, 590-647 AD

张远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戒日王研究 / 张远著.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4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文学系列)

ISBN 978 - 7 - 5201 - 2564 - 2

I. ①戒… II. ①张… III. ①戒日王 - 人物研究
IV. ①K833.5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4298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文学系列

戒日王研究

著 者 / 张 远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范 迎

责任编辑 / 刘 丹 范 迎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32.75 字 数：501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2564 - 2

定 价 / 14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文学系列

出版说明

一、本丛书选收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的优秀学术理论著作，旨在扶植青年，繁荣学术。

二、选题范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各个学科门类，著作范围不限，惟以学术水平和社会效益为标准。

三、国家重点课题、中华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青年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及青年科研基金课题的成果是本丛书选收的重点。

四、入选著作的作者年龄均不超过 39 岁。

五、本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六、本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 ·

总 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拥有一支朝气蓬勃的青年研究队伍，他们多数是毕业于本院研究生院和全国许多著名大学的博士生、硕士生，有的曾出国求学。他们接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基础知识扎实，目光敏锐，视野开阔。目前，在经济学、哲学、宗教学、社会学、法学、国际问题、文学、语言学、史学等主要学科领域，正有越来越多的青年研究人员承担起重要的研究工作。他们中间有的已经崭露头角，有的已经成为博士生导师、学术带头人，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为社会科学提供了机遇，同时，研究事业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新问题。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困难就是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是通过论著的形式作用于社会，出版问题得不到解决，研究成果就难以产生其应有的社会效应，研究人员的劳动价值也就得不到社会的承认。目前，学术著作出版难已经成了一个困扰研究人员的普遍的社会现象。名家的著作尚且难出版，青年人的就更难了，对青年科研人员来说，学术成果能否被社会所接受比物质生活待遇好坏似乎更为重要。因此，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是关系到科研队伍的稳定和研究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根本问题。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科学院仍然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学者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致力于学科建设和研究事业，在比较艰苦的科研环境和条件下不断做出成绩，这是令人钦佩和感人至深的。从他们身上，不仅能看到可贵的爱国情操和献身事业的精神，还能看到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乃至社会主义中国的希望。有这样的精神风貌，相信他们必将能够成为跨世纪的栋梁之才。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既是基于学术研究事业的考虑，也是为了实实在在地帮助青年学者，解决他们学术成果出版难的问题。通过丛书的编辑出版，一方面让青年学者的辛勤所得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另一方面让他们的成果接受社会和实践的检验和学界的评判，以利于提高他们的水平，促使他们尽快成才。繁荣学术，扶植青年，我想这是编辑《文库》的两个最重要的宗旨吧。

至于《文库》能不能起到这个作用，有没有好的社会效果，就取决于大家的努力和合作了。若干年后再来看这件事情，也许就清楚了。

胡 绳

一九九四年一月三十日

内容简介

本书是对戒日王（590~647）的系统研究。戒日王是印度历史上的著名君王，梵语戏剧史上的杰出剧作家，也是中印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戒日王留下六件铭文、三部梵剧，是波那所撰史传小说《戒日王传》的主人公，在印度铭文和梵语文论中被一再提及，在汉语史料中也留有重要记录。玄奘西游，适逢其盛世；王玄策、蒋师仁访印，遭遇他崩殂。这位印度著名君王戒日王，也因此与中国著名帝王唐太宗紧密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使得戒日王成为印度古典时期独一无二的史料“丰富”的国王。本书运用梵汉史料，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从生平、家族、都城、战争、帝国疆域、宗教信仰、中印交往、文学创作等方面深入考察这位与中国密切相关又富于传奇色彩的印度君王，并尝试通过解读戒日王梵剧和波那《戒日王传》等文学作品，从跨学科的视野和“文史互证”的角度印证和补充戒日王史料，为中印文学、文化、历史的对比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维度。戒日王在位四十余年，建立强大的戒日帝国，奉行自由的宗教政策，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作者认为，“王权”是贯穿戒日王一生的主线。生辰即笼罩王权的光辉；二重即位是获取王权的契机；战争和邦交是拓展王权的举措；宗教信仰和文学创作将政治军事的控制力蔓延到精神领域，最大限度地巩固了王权。戒日帝国的兴盛从各个角度诠释着戒日王的王权信仰，但这个相对稳定的短命王朝没有千秋万代而是一世而终，亦是源自王权的滥用与失衡。

缩略语表

AII = Goyal, Śrī Rāma, *Ancient Indian Inscriptions: Recent Finds and New Interpretations*. Jodhpur (India): Kusumanjali Book World, 2005.

ASWI =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Western India*

B = G. Bühler

CII = Fleet, John Fithfull, *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 Vol. III. Inscriptions of the Early Gupta Kings and Their Successors*. Varanasi (India): Indological Book House, 1970.

EI = *Epigraphia Indica*

F = John Fithfull Fleet

F5 本 = *IA* 第五卷 Fleet 博士校订版本。

F8 本 = *IA* 第八卷 Fleet 博士校订版本。

G = Gātha (颂诗)

G 本 = Śrī Rāma Goyal 校勘、翻译之《俱卢之野 - 瓦拉纳西铜牌》和《俱卢之野 - 瓦拉纳西铜印》, *AII*。

IA = *Indian Antiquary*

IEG = Sircar, Dines Chandra, *Indian Epigraphical Glossary*. Delhi (India): Motilal Banarsidass, 1966.

JRAS =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JESI = *Journal of the Epigraphical Society of India*

K = F. Kielhorn

L = Line (行)

M = R. Mookerji

MASI = *Memoirs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MMK = *Ārya-mañjuśrī-mūla-kalpa*

MW =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N = Note (注释)

Scharpé I = Scharpé, A., *Corpus Topographicum Indiae Antiquae: A Sodalibus Universitatis Gandavemis et Universitatis Lovaniensis editum Part I Epigraphical Find-spots*. Gent (Belgium): N. F. W. O., 1974.

Scharpé II = Scharpé, A., *Corpus Topographicum Indiae Antiquae: A Sodalibus Universitatis Gandavemis et Universitatis Lovaniensis editum Part II Arcaeological Sites*. Leuven (Belgium): Department Orientalistiek, 1990.

SG 本 = Shankar Goyal 校勘、翻译之《俱卢之野 - 瓦拉纳西铜牌》和《俱卢之野 - 瓦拉纳西铜印》; JESI, XXXI (2005), 第 136~146 页。

《慈恩传》=孙毓棠等点校, (唐)慧立等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中华书局, 2000。

《大正藏》=《大正新修大藏经》, 大藏出版株式会社, 1934。

《法显传》=章巽校注, (东晋)法显撰《法显传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寄归传》=王邦维校注, (唐)义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 中华书局, 2000。

《开元录》=(唐)智昇著《开元释教录》,《大正藏》卷五五《目录部》, T2154 号。

《求法传》=王邦维校注, (唐)义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 中华书局, 1988。

《西域记》=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 中华书局, 2000。

《行状》=(五代)冥详著《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大正藏》卷五〇, T2052 号。

《贞元录》=(唐)圆照著《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大正藏》卷五五《目录部》, T2157 号。

波那 (Bāṇa) = 波那 · 跋吒 (Bāṇabhaṭṭa)。

印历 = 印度历(参见附录五《图表》中的《印度历十二月译名对照表》)。

凡 例

“ḥ” = Visarga

“ṁ” = Anusvāra

“l(*)” = Dravidian l (l下两点, “ල”)。

“ṛ(*)” = Dravidian ṛ (r下两点, “ર”)。

“ḥ(*)” = Upadhmānīya (唇音前的 visarga, h下两点, “හ” 或 “හ”), 天城体 / 婆罗谜字体符号近似于 “ᬁ” 或 “ጀ”。

“ḥ(**)” = Jihvāmūlīya (喉音前的 visarga, h弧线上一点, “හ” 或 “හ”), 天城体为 “ᜑ”, 婆罗谜字体符号近似于 “ጀ” 或 “ᜓ”。

“◦” = 省略标记。

“_” = 梵语复合词内单词的拆分符号。

“=” = 梵语句中独立语法结构之间的拆分符号。

“ā”、“ī”、“ū”、“ē”、“ō”、“ai”、“au” = “a”、“i”、“u”等的连音。例如 ā=a+a 或 a+ā 或 ā+a 或 ā+ā。

“^” = 铭文中缺失的字母或音节的标记。

“[]” = 铭文中为原文模糊之补入字; 中文史料中的注释; 或译文中原文没有、为帮助理解而补入的字词。

“{ }” = 戏剧中的动作、表情等旁注。

“下划线” = 梵剧有下划线的人物说俗语 (Śaurasenī), 无下划线的人物说梵语。

书中译名, 古已有之者尽量沿用古译, 以玄奘译名为主。行文中译名统一, 引文中译名保持文献原貌。例如钵逻耶伽国, 玄奘作“钵逻耶伽”, 慧立作“钵罗耶伽”。正文统一作“钵逻耶伽”, 仅《慈恩传》引文使用“钵罗耶伽”。玄奘使用古字者, 改用同音今字。例如“羯陵伽国”, 引文采用奘译“羯陵伽国”, 正文使用“羯陵伽国”。古

未有之者或古译过于佶屈聱牙者采用新译，以意译为主，辅以音译。例如奘译“络多末知僧伽蓝”为音译，意译为“赤泥寺”。印度诸国译名可参见本书第五章《戒日帝国及疆域》第1节《印度诸国权力归属》中提供的异写。

序

王邦维

中国与印度的交往，至少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对于印度的了解，从最早的传说，到后来相对详实的见闻，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从知之不细，到知之渐细，前后留下了许多记载。中国古代的史书，提到印度，包括印度一些国家的名字和“国情”的不少，但直接提到印度国王的名字和个人事迹的却不多。这中间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公元7世纪印度的国王戒日王。

中国的史书中，关于戒日王的记载，为什么相对会多一些，详细一些？仅仅是因为他在印度历史上有名吗？是，也不全是。说是，是因为戒日王的确是印度历史上一位有名的国王。说不全是，是因为戒日王如果没有与中国历史上两位同样也很有名的人物有过密切的交往，中国的史书不会讲到他这么多，他在中国也不会这样为人所知。中国的这两位人物，一位是唐代的玄奘法师，一位是唐太宗。

放开来看，公元7世纪之时，在中国和印度，玄奘、唐太宗和戒日王，三位都是杰出的人物。

戒日王在印度是怎样的有名呢？20世纪的50年代，印度独立后不久，一些当时印度最好的历史学家合作，撰写了一部大部头，十余卷的印度通史，书名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大开本，每卷约有一寸厚。其中的第三卷，书名是 *The Classical Age*，书中的一章，题目是 *Harsha Vardhana and His Time*。Harsha Vardhana 是谁呢？就是戒日王。这一章的撰写者不是别人，是50年代印度最有名的历史学家 R. C. Majumdar，而 Majumdar 也正是这部大部头印度通史的主编。至于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把戒日王称为“羯若鞠阇国”国王，说戒日王从羯若鞠阇国出发，经过南征北战，把自己的势力范

围扩展到了几乎整个中印度和北印度，成为当时印度的“霸主”。这一点，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其他方面材料的证实，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的印度学者，或者把戒日王称作“羯若鞠阇国王”，或者称作“摩揭陀王”、“摩腊婆王”，或者称作“邬阇衍那的庇护者”，甚至是“北印度王”，更甚者是“五印度之王”。这些都可以说明戒日王在印度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在印度历史上，戒日王真不是一位简单的人物。

知道戒日王这个名字，还是在三十多年前。那时我在北京大学念研究生，我们的课程之一，是学习梵语，包括选读梵语的文学作品。梵文文学作品中有一部书，叫《龙喜记》，作者是戒日王。除此之外，我当时的论文题目和研究工作，很大一部分，与唐代中国求法僧，尤其是玄奘法师和义净法师的著作有关。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都有专门的段落，讲到戒日王。我因此需要了解戒日王，除了中文方面的材料，我还想看一下国外的学者有没有研究的著作。我在北大图书馆寻找，我发现，图书馆里真收藏有一本专门研究戒日王的书，作者是 D. Devahuti，书名 *Harsha: A Political Study*。这多少让我有点惊喜，因为我知道，20世纪的80年代，北大图书馆收藏的外文书，50年代前出版的不错，50年代后的不多，中间有个明显的缺段，这本书1970年出版，但图书馆却有收藏。

D. Devahuti 的书，在当时看，写得不错。只是我发现，戒日王的研究，很多地方，尤其是涉及具体的历史年代，需要依凭的是中文方面的史料。但作者在中文史料的使用方面，却存在一些问题。作者不懂中文，依靠英文翻译，有的翻译得很早，已经过时，有的翻译得不好，使用起来自然会出问题。这让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既然戒日王这么重要，什么时候，中国的学者是不是也应该在这方面做出一点贡献？不过，三十多年的实际情况是，虽然戒日王跟中国有不少的关系，中国学者对于戒日王的研究，多年来实在太少，已有的不多的一点研究，也谈不上深入。

这样的情况，如果说现在有了改变，那就是张远即将出版的这部书。张远的书，以戒日王研究为题，基础是她2013年6月在北京大学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后来又加以补充和修改而成。这样的工作，依我所知，国内还没有人做过，国外虽然有学者做过，但涉及的往往是

某一个问题或某一个方面，整体性的研究也很少。

与戒日王相关的资料，张远收集的，可以说比过去研究过这个题目的学者都更多、更全。当然，张远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后来居上，可以使用和利用晚近一些的新材料。但还有一个原因也不可以排除，就是因为我上面提到的，历史上印度的国王，没有一位像戒日王这样，与中国有过这样多的，以个人为对象的接触。因为玄奘，通过玄奘，又有唐太宗，汉文的文献中史无前例的有这么多的有关戒日王的记载，这为中国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方便的切入点。张远作为一位中国学者，这是她的方便之处。

不过，切入点也只是切入点，方便也仅仅只有一点点的方便，如果不能把视野放开，不能广泛地把印度方面的资料，尤其是考古的发现，与汉文的材料结合起来，分析，考证，解读，仅仅依靠后者，要想研究戒日王，也是不可能的。做这样的研究，首先需要搭建的，是一个多语言资料、完整的研究框架，同时还要兼顾到历史、文学、宗教、考古各个方面。张远为此做了很大的努力，包括在学期间争取到机会，到哈佛大学访学一年，广泛地寻找和查阅各类资料，因此最后在研究上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在我看来，她完成的工作，无论对于国内的印度史研究，还是印度梵语文学史的研究，还是中印关系史的研究，都有意义。

除了资料的收集，张远的研究，还包括分析问题。这方面我只举张远书中的一个例子。

玄奘法师到印度求法，在印度的那烂陀学习佛教的时候，正是戒日王的时代。戒日王是当时印度最有影响的国王，他听说在那烂陀有一位从中国来的僧人，于是约见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五有一段，记载了二人首次见面时的对话。

戒日王见到玄奘，第一句话就问：“自何国来？将何所欲？”

玄奘回答：“从大唐国来，请求佛法。”

戒日王问：“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亘，去斯远近？”

玄奘回答：“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

戒日王又问：“尝闻摩诃至那国有秦王天子，少而灵鉴，长而神武。昔先代丧乱，率土分崩。兵戈竞起，群生荼毒，而秦王天子早怀远略，

兴大慈悲，拯济含识，平定海内，风教遐被，德泽远洽，殊方异域，慕化称臣。民庶荷其亭育，咸歌《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于兹久矣。盛德之誉，诚有之乎？大唐国者岂此是耶？”

玄奘回答：“然。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昔未袭位，谓之秦王。今已承统，称曰天子。前代运终，群生无主。兵戈乱起，残害生灵。秦王天纵含弘，心发慈愍，威风鼓扇，群凶殄灭，八方静谧，万国朝贡。爱育四生，敬崇三宝。薄赋敛，省刑罚。而国用有余，氓俗无穴，风猷大化，难以备举。”

戒日王于是感叹说：“盛哉，彼土群生，福感圣主！”

这一段记载，也见于玄奘弟子慧立和彦悰为他撰写的传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及其他的一些史书，包括《新唐书》、《旧唐书》，文字上虽然稍有差异，但基本一样。玄奘对这段场景的描写，颇具戏剧性。但就是因为太有戏剧性，后来的人就有了怀疑：这是不是玄奘为了讨好唐太宗，无中生有，编出来的一段故事？

说实话，最初读到这一段时，我也有疑问。所有的疑问中，最突出的一点，是玄奘与戒日王对话中提到的《秦王破阵乐》，当时的戒日王，能知道中国的《秦王破阵乐》吗？但张远对此做了分析，结论是有可能。我不敢说这绝对地正确，但张远的分析和推断，有一定的道理。古代世界物质和文化信息的交流，频密的程度往往超出我们今天的设想，中印是近邻，作为乐舞的《秦王破阵乐》，当时为印度人所知，不是没有可能。张远在她的书中讲了，《秦王破阵乐》在唐代传到了日本，也传到了吐蕃，也就是今天的西藏，这在史书中有明确的记载。时代相同或相近，如果说《秦王破阵乐》作为乐舞，能够完整地传到西藏，此前一个有关《秦王破阵乐》的消息传到了印度，我们似乎不应该奇怪。玄奘讲述的故事，是有些“歌德体”的风格，但放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和话语背景下考虑，可以说有套话，但不是假话。

戒日王与唐太宗，虽然没有见面，但大唐与戒日王的国家——史书里以“摩揭陀国”相称——之间正式的外交往来，却是从这两位大国君主互派使节开始的。中印外交历史上的几位有名的人物，梁怀璥、李义表和王玄策，也都是在这个时候受命出使印度，其中的王玄策最为著名，三次出使印度，还有更多的故事。对此张远的书也做了很好